

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区三省的战争动员与土地革命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央苏区边区闽赣、粤赣和赣南三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积极的战争动员,迅速扩大红军队伍,并承担粮食征集等战争勤务任务。同时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坚决武装保卫秋收,并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仍然坚持财政正规化建设,为土地革命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中央革命根据地; 边区三省; 战争动员; 土地革命

doi: 10.3969/j.issn.1008-3928.2014.04.019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928(2014)04-0077-04

土地革命后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中央苏区)的南部边界,党中央先后成立闽赣、粤赣和赣南三个边区省。1933年5月,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党中央在黎川、建宁和泰宁地区建立闽赣省,一直坚持战斗到1935年5月。1933年8月,为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党中央以会昌为中心建立粤赣省。该省在赣南省建立后于1934年10月自然解体。1934年8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最后一刻,党中央决定划出粤赣省部分地区,以宁都为中心成立赣南省,一直坚持战斗到1935年3月。边区三省地处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最前沿,承担着艰巨而繁重的战争动员任务,其土地革命任务也因此更加严峻和复杂。但是目前中共党史学界对边区三省的研究尚显薄弱。

边区三省与中央苏区的两块中心区赣南即江西省、闽西即福建省相比,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地位。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委会决定成立闽赣省时指出“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实为夺取抚州、进攻南昌的必要条件。”^{[1]24} 中央苏

区领导认为“闽赣根据地地处武夷山脉,进可攻,退可守,东可以威胁福州,西可以威胁南昌,北与赣东北呼应,军事上政治上地理上都处重要地位。”^{[1]173-174} 闽赣省委对此也有清醒认识“建黎泰苏区是中央苏区最主要的门户,是中央苏区与闽北闽浙赣苏区联系的关键,是目前彻底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决战中决定胜负的战略中心。”因此闽赣省委的中心任务是“发动和领导建黎泰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巩固建黎泰苏区向两省之间发展。联系金资闽北成为一片苏区,争取新的决战的全部胜利”^{[1]35-36}。1933年8月1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鉴于“江西省苏管辖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同时为着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深入现区域的阶级斗争,开发钨矿和发展进出口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决定以会昌为中心建立粤赣省。^{[2]26} 边区三省承担着巩固南部边界、支援反围剿的战略任务,这决定了边区三省在战争动员和土地革命问题上,具有与中央苏区不同的特点。

收稿日期: 2014-05-22

作者简介: 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一、边区三省的战争动员

1. 粮食征集与战争勤务

边区三省地处反“围剿”战争最前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承担战争勤务的主要职能。其中又以对粮食这一重要战略物资的征集最为紧要。

闽赣省成立后即开始了围绕粮食征集为中心的战争动员。1933年5月19日,中共黎川县委通知:“要以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深入战争动员一切工作,特别加紧揭破敌人欺骗宣传,与对群众的压迫剥削罪恶,刺激群众的阶级仇恨,发扬他们坚决应用杀敌精神与敌人作拼死战争。”^{[1]25}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号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来动员广大群众,收公谷,或群众借给红军的谷子,很快的做出米来,送给红军,使红军不至发生粮食的困难”^{[1]81}。闽北分区苏维埃执委会提出向群众借谷一万五千担给红军。“在借谷时候,一定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禁止强迫摊派。^{[1]87}闽赣省委特别强调“政府首先要注意粮食的收藏,保证长期作战中红军粮食的充裕。”^{[1]120}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激烈进行,粮食形势更加严峻。1934年7月9日,闽赣战地委员会呼吁:“要夺取豪绅地主反革命手中的谷子,打破他们对我们粮食的封锁”,为此“必须刺激群众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从查田查阶级分豪绅地主谷子等基本斗争中启发群众,武装广大群众到进行武装斗争”,同时把这一斗争与肃清刀团匪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1]153}

粤赣省则通过开展突击队运动征集粮食。1934年1月,粤赣省苏维埃命令“将早先原有的扩大红军突击队改为收集粮食的突击队”。为切实筹集粮食,粤赣省苏维埃要求在收公债或土地税时,“实现普遍的收谷子不要收现金”,说服和鼓励群众“踊跃的拿谷子来购买公债与缴纳土地税”^{[2]69}。1934年7月,粤赣省委、省苏维埃把收集粮食作为上半月的中心任务,号召群众节省粮食供给红军,没收和征收地主富农的粮食。^{[2]76}粤赣省委在借谷工作中坚决反对平摊倾向,认为“平均摊派不但不能兴奋与发扬群众的借谷高度的热情,反而抑压了群众的借谷情绪”。同时,各级政府“指导粮食部注意粮食动员工作之外,要特别注意保管转帐登记运输等工作,要使得粮食部在借谷运动中起有力作用”^{[2]108-109}。

毛泽东主席总结出赣南省粮食工作三条经验:发动群众,以最快的速度把粮食运下来;如果运不下来,就将粮食发给群众;时间来不及,敌人来了,就放

火烧掉,不让谷子落在敌人手里。^{[2]223}

边区三省还承担着其他战争勤务职能。如闽赣省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积极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支援前线,共计动员伙子440人。运输队以班排连编制,以连为伙食单位,每连100人。^{[1]83}建宁县于1934年5月动员担架队员1300多人。^{[1]144}

2. 扩大红军运动

除以粮食征集为中心的战争勤务外,扩大红军运动成为边区三省战争动员的又一重点。在扩大红军运动中,边区三省重视吸收中心区域的经验,多采取动员地方武装和少先队整体加入红军的方式完成扩红任务。

1933年5月,闽赣省委号召“利用最近长汀、兴国的经验,特别要以加强赤卫军少先队的工作去进行有组织的动员,动员整连整团加入红军”^{[1]36-37}。1933年6月13日,闽赣省少共队部训令,要求“全省在八一以前完成充足师三千六百人。黎川县完成充足的一营一连五百六十人,建宁县要完成充足的一连一百四十人,光泽县要完成充足的二连二百八十人,闽北要完成完全的二营八百四十人”。各县要做好训练,“争取整排整连整团的加入少共国际师”^{[1]48}。闽赣省委响应中央号召,决定于1933年7月第一周举行“创造七军团宣传周”。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决定在8月的第一周举行“扩大七军团突击周”。届时黎川将创造一个黎川团,崇安将创造一个崇安营。^{[1]50}由于“现有的独立师团等地方武装,大部分将编入红七军团”,所以省委要求在1933年6月至8月,“各县应完成一个新的独立团或独立营,扩大游击队”^{[1]52}。闽赣省各地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如黎川县委号召要“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地方武装与加紧归队运动”。具体任务是“坚决积极完成竞赛条约的数目,在(1933年5月)二十号以前要做到超数目一半以上”^{[1]26}。他们还表示要“在(1933年)八一以前完成一营,人数七百人;创造独立师,八一以前完成第二团;创造赤卫军模范师,八一以前完成一师。总的决定在十月革命节前完成黎川团、独立师的创造”^{[2]55}。

粤赣省委的扩红工作和粮食征集一样,也采取突击方式开展。省委决定1933年10月7日至11月7日为扩大红军突击月,号召在会昌、于都、西江三县每县创造一个模范团。为此省苏要求加紧领导城乡代表会的动员,鼓励订立个人之间、村之间的竞

赛公约,抓紧地方武装动员,特别是把模范营作为扩大红军的基础。^{[2]36-37}为完成扩大红军任务,省委要求各级党部“立即组织大批的有力的突击队,进行猛烈的突击,特别是突击火力要集中到那些工作有基础以及报名最多的区乡”。省委强调在扩红工作中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干部带头报名来带动群众参军。^{[2]55}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粤赣省扩红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门岭县1933年9月动员模范营共450人;西江县砂星区动员44人,新迳区动员168人,超过原计划一倍。^{[2]62}甚至在粤赣各县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代表们踊跃报名参军的可喜场面。于都县当场报名120人,西江县报名27人,筠岭县报名23人。^{[2]64}粤赣省党组织还配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提出在1933年九、十、十一月扩大一万五千名新战士到红军中。^{[1]31}

总之,边区三省的粮食征集和扩红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力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二、边区三省的土地革命

1. 查田运动与其他经济工作

由于边区三省地处南部边界,其赤白交界的社会环境并不适合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但是尽管如此,边区三省党组织仍然把土地革命作为推进苏区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三省建省时,正值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展开之时,因此三省就把贯彻查田运动精神作为土地革命的重点来抓。

1933年5月,闽赣省委成立后即认为“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发扬群众斗争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建黎泰苏区的基本条件。”因此要做到“在没有分田或没有按照正确原则分配的区域,必须尽一切力量在半个月分配完毕。在已经分配的区域,必须立刻完成查田运动”^{[1]36}。闽赣省委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省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重申“在假分田及不分田的地方,应即进行分田斗争,山林塘园都必须彻底分配。”^{[1]120}因此,虽然闽赣省为中央苏区边区省,但是土地革命工作仍然坚决贯彻中央苏区的精神,“红军打开一个地方,就进行分田地,在分配方法上首先组织土地委员会,然后经过土地委员会去分配。建宁泰宁大部分都分了田地,是按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分。”^{[1]185-186}闽赣省委指示资溪县委,“查田运动要按照中央局、中央政府的指示,以及根据过去的经验加紧进行”。查田应与当前经济工作相结合,“必须

密切联系到秋收与收集粮食的工作”。查田工作要坚决贯彻阶级路线,“对逃跑出去的地主富农的财产田禾立即没收分配,对贫苦工农的财产加予保护,对他们的田禾的耕种,发动群众帮助,这样深入阶级分化,争取出走白区的群众立即回来。”^{[1]69}各地纷纷根据具体情况开展查田运动。如黎川县委“按各区实际情形,要分过的即重分,一个月完成;不要分过的即举行查田运动,二十天完成”^{[1]55}。

尤其可贵的是,闽赣省查田运动的进行是与纠正“左”倾错误同步的。闽赣省在纠正了建宁把50余户中农、贫农误打成土豪的错误后,通过联系检举反革命斗争,使查田运动更深入地进行。结果,全省在1934年4月的查田突击运动中查出地主50余家、富农60余家、田2300余担。^{[1]140-141}

鉴于赤白交界的复杂形势,粤赣省强调查田工作中革命的阶级路线的贯彻。1933年9月,省苏维埃号召在查田运动中“普遍发展贫农团,坚固地联合中农”,从地主罚款和富农捐款中进行筹款工作。^{[2]29}1933年9月,省苏维埃号召“洗刷那包庇富农地主的份子出苏维埃机关”,大胆提拔在查田运动中表现积极的进步分子。^{[2]30-31}1933年11月,省委表示“坚决反对一切对查田运动的机会主义与那些反映地主富农思想而阻碍查田运动的妥协分子;同时不要放松反对侵犯中农利益与过早消灭富农的左的错误”^{[2]48}。1934年7月,省委、省苏维埃要求“继续进行查田,依照正确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把暗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土地分配与群众”^{[2]77}。

查田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闽赣省成立六个月即查出土豪700余家,富农1100余家,田地一万余担。^{[1]112}1933年12月崇安县查出富农16家、地主2家,建阳查出富农52家、地主3家,“没收了地主不少的田地和没收了富农的非劳动分田和好田,发分给贫苦工农。”^{[1]123}1933年11月,粤赣省共查出地主土豪863家、富农1260家,反动富农179家,清查冒充中农贫农的土地32382担,这些土地全部分给贫苦农民或补给失业工人。^{[2]61}

查田运动的深入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其他经济工作的进行。1934年秋收斗争关系到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前途。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闽赣省党组织领导群众展开艰苦的保卫秋收斗争。省委明确地方武装的责任,在于“以武装起来消灭刀团匪,分配土地,保卫秋收的口号发动群众”,组织并武装群众,“争取被欺骗胁迫加入刀团匪的群众回来”。在

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应结合土地革命来保护秋收。而在环境复杂多变的边境地区,“须积极游击,穿插打击敌人割禾队、抢谷队,截击敌人的粮食运输,领导并组织群众坚壁清野,领导和掩护被占领地出来的群众回去插自己的禾,把谷担来苏区”。挺进到白区的游击队还应该发动白区群众开展以抗租为内容的秋收斗争。收割时,部队要就地帮助群众收割,机关脱产人员要发挥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精神参加收割,特别是“必须注意把谷子运到安全地区来保存”。在赤白交界地区,“应坚持坚壁清野,在禾将近成熟,勉强可以收割时,就迅速动员最广大群众,尽日尽夜把禾割尽”。为安全起见,最好黑夜去割,以避敌人据点射击,收割完后,随即运到安全地带保存。^{[1]155-157} 粤赣省的保卫秋收工作则把争取逃跑群众返回苏区参加秋收作为重点,“抓紧附近占领区豪绅地主以及国民党在秋收中的逼租逼债、新的苛捐杂税的事实,来把苏区的秋收与国民党的秋收对立起来”。在组织割禾时要“充分的在政治上动员与切实解决他们自己的劳动困难,动员来后应有严密的编制分班分排的组织,指定人负责管理”。要注意解决劳动力分配问题,“特别红军家无劳动力应解决,一定要组织先割红属的禾。”^{[2]86-87}

在中央苏区中心区取得显著成绩的合作社运动,在边区三省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闽赣省横村区一乡苏维埃向工农群众集股办消费合作社,打击富农奸商操纵食盐价格。股金“由工农群众自议担负,每股大洋一元。股金集齐即马上到白区去采办食盐,使得我们苏区群众买便宜食盐”^{[1]108}。闽赣省建宁县还借助合作社在群众的积极影响力促进推销公债任务,14天即推销9000余元。^{[1]112}

2. 财政正规化建设

边区三省虽然缺乏和平建设的环境和理财条件,但是仍然坚决贯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正规化建设的指令,力争财政工作的正规化。

1933年11月12日,闽赣省财政部表示要改变财政工作缺少预算的状况,要求各地1934年“一、二个月的预算要同时编制,但须每月各编一张;区一级于文到之日,须立即着手编制(闽北除外),限本月十八日编好送县,由县于二十日编制好送省,以便省审查完毕,编好全省总预算送中央财政部批准签领支票;预算一经批准之后不得请求变更;自十一月起各机关不得向支库或财政部借款;各区行政费要按

预算向县财政部领取,不得将收入之款擅自动用”^{[1]107}。闽赣省苏维埃政府也表示1934年力争做到“节省开支,加紧筹款,充裕财政,动员群众,拥护苏维埃的一切税收、苏维埃的国票,迅速完成收土地税的工作”^{[1]120}。闽赣省的土地税以建国公粮名义征收,“采取每人平均年产一百斤干谷收五斤,产二百斤收十四斤,产三百斤收三十斤的累进法征收”,可满足全省党政军每人一斤半口粮。^{[1]190}

粤赣省税收工作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顽强展开。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在筠门岭设立关税总处,旨在稳定市场秩序和控制进出口,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因此,税率根据是否有利于苏区生产和人民生活而定。“在进口方面,有的可以免税,有的则提高税率或不准进口;在出口方面,对敌人迫切需要的粮食、茶油则禁止出口”。如对绸缎征50%重税,而对食盐、土布等必需品免税,对耕牛、粮食等则禁止出口。另外,在靖石设立贸易局与广东军阀当局开展贸易。^{[2]122-123}

1934年9月26日,赣南省军区、省苏维埃联合通令,要求“凡属未脱离生产或已脱离生产只限于一县境内游击队受县区军事部指挥之游击队,由十月一日起,其经费领取与筹款工作的指挥,均按照中革军委与中央财政部八月七日与三十日联合命令执行,各县军事部与财政部须立即负责按其人数与须要编造预算,如须津贴或特别用费时,须得县军事部与财政部会同批准,不得私用;游击队所筹之款项须随收随缴同级财政部”^{[2]219}。这时距离中央红军长征已不足半月,而赣南省仍然从容铺排财政正规化事宜,其科学精神值得高度肯定。

综上所述,闽赣、粤赣和赣南边区三省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通过积极的战争动员,猛烈扩大红军,承担了粮食征集等战争勤务任务。同时深入开展查田运动,坚决武装保卫秋收,并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刻仍然坚持财政正规化建设,为土地革命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 [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三辑) 中央苏区闽赣省专辑[M]. 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0.
- [2]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江西党史资料(第十一辑) 中央苏区粤赣省、赣南省专辑[M]. 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9.

(责任编辑:张明海)